

纪念诗文集

常州词派

二

百年

七十岁

岁暮小记

老竹园

海山

常州词派

集繹山

誦古思今
稽古作書

恭甫同年尊兄將歸福州書以爲別

登高念遠
時自念之

武進愚弟張惠言

誦古思今
道在作者
登高念遠
時自樂之

(張惠言篆書聯)

丁丑夏為常熟詞派二百年學術研討會
鐫刻張惠言詞句日晞堂並記



常州词派二百年 纪念诗文集

目 录

[代序]

- 陈三林:表示一点纪念和支持的心意 (1)

[论文]

- 方智范:常州词派与近代词学批评 (3)
- 曹济平:重新认识常州词派 (15)
- 杨海明:简论张惠言‘尊体’词学观点 (25)
- 王步高:试论周济的词学观及其诗学理论基础 (29)
- 张 珂:清代的常州词派与词人 (48)
- 钱璩之:论张惠言 (59)
- 张平生:试论张惠言‘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之词学主张
..... (73)
- 陈 弼:张惠言‘茗柯’寓意探析 (80)
- 荣凯元:气度深婉 意境清新
——读张惠言《玉楼春》词 (83)
- 王鉴风:读董士锡的《齐物论斋词》 (87)

[笔谈]

- 姚广圻:我的几点看法 (96)
- 闻楚善:我所认识的常州词派 (98)
- 陈既白:常州词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100)

[诗词]

前人评论常州词派·····	(102)
朱祖谋:望江南(三首)·····	(102)
卢 前:望江南(五首)·····	(102)
夏承焘:瞿禅论词绝句(三首)·····	(103)
唐圭璋:点绛唇·清名家词题辞·····	(103)
纪念常州词派开创二百周年	
钟振振:五古(一首)·····	(104)
羊牧之、何兆年、孙显、奚德椿等七律(四首)·····	(105)
吴逸鸥:五律(一首)·····	(106)
羊 淇:七绝(一首)·····	(106)
羊 淇、姚广圻、谢孝宠、钱璩之、羊 汉、桑凤岐、叶鹏飞、 王鉴风、吕锦尚、章之驹、张仁迪、还 村等词(二十六首) ·····	(107)

[年谱]

谢 忱:张惠言年谱·····	(118)
----------------	-------

[后记]

编者·····	(150)
---------	-------

[插页]

张惠言手迹(篆书楹联一副)

王日曦印章(六枚)

[封面]

书 法:谢稚柳

设 计:邵 黎

[代序]

表示一点纪念和支持的心意

常州市副市长 陈三林

张惠言是清代乾嘉年间闻名全国的一位常州学者、散文家、词人和书法家。他不仅是“阳湖文派”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常州词派”的开创者。1797年（嘉庆二年），张惠言在所编的《词选》序中，提出了改革词风的论说，主张尊词格，重立意，讲比兴，求寄托。之后常州府宜兴县的周济发挥张的学说，进一步主张词为“论世”之“史”，要求反映现实社会。这时期，常州的一批词人大都推崇张的学说，进行创作实践，乃形成了“常州词派”。“常州词派”的崛起一扫当时词坛占统治地位萎靡不振的词风，使词坛面目为之一新。这个影响是深远的，直至晚清和近现代，张的词论和“常州词派”仍为词坛推崇。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其中某些偏颇流弊，这也是很正常的。

今年是张惠言《词选》问世，“常州词派”开创二百周年，为了纪念我国词学史上这次重大的变革和创新，常州市文联、文化局和舢舨诗社在常州市人民政府积极支持下，联合举办“纪念张惠言《词选》问世，常州词派开创二百周年学术交流会”，约请国内专家、学者、诗词家撰写一些论文和诗词，并编辑成《常州词派二百年纪念诗文集》付印问世，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盛事。这不仅能对学习、研究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及其建立“常州词派”的创新精神起到推动作用；并对适应当今时代要求，振兴词学，推动词作，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对张惠言词论和“常州词派”过去知之甚少，谈不上为纪念诗文集作序，仅就工作职务之便，表示一下对这次纪念活动和所出的书积极支持和虚心学习的心意而已。

一九九七年八月

[论文]

常州词派与近代词学批评

方智范

近代中国是各种文化思潮此伏彼起、各种思想观念多元并存的时代。在文学领域，新与旧对立，创新与复古并行，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就创新的一面说，顺应着戊戌变法后狂飙般的改良维新思潮，梁启超接连高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戏剧界革命”的口号，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小说和戏剧，作为通俗文艺范畴的文体，其地位和功能被抬举到足以用来救国救民的高度。而属于正统文学范畴的诗歌和散文，也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于是诗文创作从观念、风格到语言都发生了很大变易，梁启超“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新文体”，以其新锐激进的见解和自由挥洒的文笔，显示出独特魔力；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主张和诗歌作品，梁启超的“新派诗”，力图以“新题材、新意境、新思想”来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这些创新的努力，都使古代传统文学的根基发生动摇。

与上述情形相比，耐人寻味的是，近代词学领域，居然是一块相对安然的古典领地。它没有像诗文那样受到改良维新思潮的巨大冲击，相反，仍然依照其固有轨道作惯性的滑行，而且日见光彩。要简单明了地解释这一现象并非易事，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近代词学理论和创作的这种“超稳定性”。

首先，发轫于嘉庆初年，大畅其道于嘉、道之交的常州词派，正好跨进近代社会的门槛，这一词派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创作理论原则，在时代条件的促成下，对词的创作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影响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看出：

一是“感慨所寄，不过盛衰”的“词史”说（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在直接表现和反映近代中国重大事件的词作中得到验证。如禁烟大臣林则徐、邓廷桢等均有直接反映鸦片战争风云的篇章，生活在福建沿海一带的词人如张景祁、谢章铤等，也写了一些涉及中法战争、台湾问题及痛斥沿海“夷氛”骚扰的词作，因此，他们的作品被词学家谭献（复堂）称为“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篋中词》）；蒋春霖的《水云楼词》，表现了时代的乱离和词人自身的哀怨心理，确是那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实录，谭献称之为“倚声家老杜”，与杜甫之“诗史”相提并论……如此等等，都表明常州派的“词史”说在近代仍有其理论生命力。

二是“词主涵谏”的变风变雅说，因植根于传统诗教的土壤之中，重视词体的社会政治抒情功能，又主张委婉以讽，哀而不伤，正好迎合了那些政治倾向未必激进，但颇重视出处进退大节的士大夫的心灵意向，于是以幽隐委曲之辞，抒猿啼鹤泣之情，一时成为风气；而常州派一贯倡导的“意内言外”（张惠言《词选序》）、“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这种特殊艺术手段，正宜于他们倾吐对政治现实的曲折感应，表达那种若隐若现的心境意绪。晚清词人庄棫、谭献、王鹏运、况周颐等的词作，多咏叹回天无力的哀怨和世纪末的感伤，可说颇具典型性。在戊戌变法中属于帝党、后被慈禧革职的文廷式，其《云起轩词》，也通过词作曲折含蓄地讥评时事、表明心迹。即使像龚定庵这样的大家，也每每在词中以奇崛恹恍的意境，来呈现那个风雨如晦年代的知识精英的“箫心剑态”——一种疏狂而又孤独、郁勃而又凄婉的精神世界，他的作品多与常州派的创作主张相合。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创作情形，那就是借常州派“推尊词体”之名，以填词作为回避现实的象牙塔，作为维持自我心态平衡的手段，其作品缺乏真正的社会价值。即如著名的晚清四家也在所不免。据近人徐珂《近词丛话》载：“光绪庚子之变，

八国联军入京城，居人或惊散，古微（朱孝臧）与刘伯崇殷撰福姚就幼霞（王鹏运）以居，三人者痛世运之陵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约为词课，拈题刻烛，于喁唱酬，日为之无间。一阙成，赏奇攻瑕，不隐不阿，诙谐间作，心神洒然，若忘其在颠沛兀臲中，而自以为友朋文字之至乐也。”但就总体而论，近代词的创作是取得了相当成就的，其主流确乎超轶了浙西词派及其追随者之抒写流连光景、离别怀思之情的范围，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成为千年词史最后的回光反照。这是以复古为特色的常州词派在近代仍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其次，词学研究至近代，可说是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的阶段。一方面，乾嘉以后，古文经学式微，今文经学派转向经世致用，考据、辑佚、校勘之学渗透其影响于一向被视为小道的词学领域，清儒的科学实证精神在这块古典领地得以存亡续绝，于是，斟正词律、校勘词籍、辑佚词作、汇刻词集俨然成为学者们精力专注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总结性成果。朱孝臧被公认为近代词学一大家，张尔田（孟劬）有云：“盖自王佑遐（鹏运）之校梦窗，叙述五例，以程己能，先生循之，津途益辟，是故乐府之有先生，而后校讎乃有专家，下与陈、晁竞爽，上与向、歆比隆，六义附庸，蔚为大国，遂使声律小道，高躋乎古著作之林，与三百年朴学大师，相揖让于尊俎之间，在于三累之上。”（《强村遗书序》）从而称此为“词学之极盛”的阶段。的确，近代词坛在词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也可以说是常州派推尊词体、使登大雅的观念所酿成的积极成果。

说近代词学研究具有总结性意义，其另一方面的蕴涵，是指词学理论批评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相对于古代诗论、文论的早熟，我国古代词学理论批评本来就是文学理论批评中后起的一翼；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词学理论与诗文革新理论相比又明

显滞后，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几乎没有受到时代思潮的冲击，当然也谈不上观念的更新。但是，从另一角度看，道光以后出现的一大批词话论著，正是为原本相对薄弱的词学理论批评补上了重要的一课，近代词论家们以传统的价值观为标准，来逐一衡量唐宋以来整个词史的丰富积累，确认其社会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总结出关于词的创作和鉴赏的规律，这样，近代词学理论批评就成了中国词学理论批评发展全过程的一个光荣的结局。

二

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为词坛所瞩目和接受，是在道光以后，至晚清竟主盟坛坫。宗仰常州派的词话著作接连问世，从不同方向推阐张惠言、周济的观点。其中最主要的，有谭献《复堂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即使那些并不标榜派别门户的论著，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刘熙载《艺概》中的《词概》，也有常州派论词观点的影响。总的说来，主常州派观点的论者，政治上多倾向于守旧，文学观念上又难脱复古藩篱，沉湎于历史，着眼于过去。拘限于传统，是其共同特点。即使像梁启超这样一位敢于大破大立的文坛勇将，一进入词的领域，也是“规行矩步”，试览他在《艺蘅馆词选》中的评词之语，一味崇尚古雅，了无新见。于此可见传统词学观念在士大夫文人中是何等根深蒂固。

然而，晚清常州派后继者的词学理论批评自有其成就和价值。这是因为，其一，从词的创作自身演进的历程看，唐宋极盛，元明转衰，至清复振，其中一个基本趋势，是词与它的音乐本体日渐分离，词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文学体裁，因而必然要求强化其文学抒情的功能。而清代的词，正承担着这样的任务。清词两百年来，其运行的轨迹是蜿蜒曲折的，而先后出现的词学流派及其理论批评家们，则在不断努力矫正着清词的前进方向。在这矫正的努力中，就有着积极健康的文学美学观念在起作用。换言之，传统词学理论内部，尚有根据不同时期创作趋向进行自我调整和修正的机

制，前之共趋，即今之偏废，今之独响，即后之同声。这种因革关系，到了晚清常州派的词论家那里，就体现为对词体本性和词体功能等问题的独特理解和追求，于是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有人把近代词学理论观点的不断演变称为“从复古求改良”：

中国之学，务在师古，欧美之学，专尚改良。词至南宋，可谓精矣。至元而音律破坏，除二三名家以外，已不履读者之心。有明一代。词曲混淆，等乎诗亡。清初诸公，犹不免守《花间》、《草堂》之陋。小令竞趋侧艳，慢词多效苏、辛。竹垞（朱彝尊）大雅闲达，辞而辟之，词体为之一正。嘉庆初，茗珂（张惠言）、宛邠（张琦），溯流穷源，跻之《风》《雅》，独辟门径，而词学以尊。周止庵（周济）穷正变，分家数，为学人导先路，而词学始有统系，有归宿。……故以清代词学而论，诚有如外人所谓逐渐改良者。（蒋兆兰《词说自序》）

毋庸讳言，这段话是站在常州派立场上立论的，但也道出了传统词学内部因革变化的客观事实。周济作为继张惠言之后的常州派中坚，其理论“有统系，有归宿”，确实超出前人；在他之后，晚清常州词论家还在继续推衍发挥该派的理论观点。清季词人“色色皆精，蔚然称盛，殆亦时会使然”（蒋兆兰《词说》），这里所谓“时会”，除了指时代社会因素从外部对晚清词的创作和批评进行推动外，也可理解为晚清的词论家们得前贤之滋养，有较高的审美眼光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在词体、词格、词心、词境、词法等方面深有造诣，故所论往往后出转精，时见创获。

其二，唐宋词创作繁盛而词学理论批评相对薄弱，元明两代亦未能承担起总结词学的任务。只有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之后，一则凭借前代和当朝的丰富创作和鉴赏经验，二则借鉴历代诗论、文论成果转而论词，三则在经学熏陶之下，人们对问题喜作系统的理性思考，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对传统词学进行全面总结的理论成果，故对于晚清常州派的词学理论批评，就不可视为一时或

一家之论了。

晚清词学理论成果具有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征，那就是系统性、论辩性和示范性。

所谓系统性，是指晚清词论家多能概括出核心观点，然后围绕它作逻辑上的推衍，使自己的理论思考能构成完整自足的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言。我们知道，清初的阳羨派、浙西派开创者均无专门的词学论著，常州派开山张惠言也只是一篇《词选序》作为理论纲领，然而奥蹟始开，明而未融；继起者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所述观点如“词史”说、“寄托出入”说、“宋词正变”说固然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毕竟因论述太过简略，其理论构架隐约难辩。晚清常州派词论家的词学论著，纳体系于漫话之中，核心观点明确，论列清楚，较易把握，如谭献提出“折衷柔厚”，陈廷焯标举“沉郁温厚”，况周颐揭橥“重拙大”，以此为核心来穷源流正变之迹，考得失利弊之因，力求维持概念和逻辑上的同一。

所谓论辩性，是指晚清词论家们多有明确的理论对立面，门户森严，各不相让。这种倾向肇端于周济，他力主反浙派，贬姜（夔）张（炎），崇北宋，尊周（邦彦）吴（文英），显示了鲜明的批评倾向和自觉的流派意识。此后，宗尚常州派的词论家们均从中得到启示，踵事而增华，各自强调常州派理论中的某一方面，把自己的解释说成是最完善的，仿佛得了不传之秘。有人把这种情形譬喻为“犹之书家观剑器，见争道，睹蛇斗”。（蒋兆兰《词说》）

再一个特征是示范性。清人选词风气颇盛，与立派的努力相辅，阳羨派有《荆溪词初集》，浙西派有《词综》，吴中派有《宋七家词选》，均欲以选本表明评价标准和取向，以垂范于当世词坛，但一般选得驳杂不精。常州派起，尤注重选词，或精选前人词作加以评笺，或检阅派别中人的创作经验，把批评原则融贯于选本

之中，得虚实相兼之胜，从而使其理论主张更加彰明。张惠言的《词选》以精严著称，周济仿此而编《词辨》和《宋四家词选》，显示出常州派词选以辨明正变为特色。晚清常州派词论家几乎都操持选政。如谭献有《复堂词录》、《篋中词》，陈廷焯有《词则》，冯煦有《宋六十一家词选》，其中进退古人、入主出奴，皆以自己的理论主张为转移，有意示人津筏，度人金针。

以上特征，反映了晚近词论家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这正可看作词学理论批评进入总结性阶段的标志。

三

晚清常州派词论家的词学理论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词的社会作用和抒情功能的确认；二是对词体审美属性和词的鉴赏规律的探讨；三是确立艺术规范，总结作法技巧。鉴于晚清几种著名词学论著如谭献《复堂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和况周颐《蕙风词话》等，学界论述已多，而常州派影响之大、声闻之广，又决不限于此，故笔者专从其他词学论著来作一评述。

先谈第一个方面。自武进张惠言提出词之用在“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词选序》），荆溪周济倡言“感慨所寄，不过盛衰……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介存斋论词杂著》）之后，在常州派传人那里，词的重大社会作用和抒情功能普遍得到认同。他们视诗和词为同样的“言志”之体，痛斥“词为小技”、“卑体”之说。例如，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的沈祥龙的《论词随笔》，明确提出了“词言志”的论点：

词导源于诗，诗言志，词亦贵乎言志。淫荡之志可言乎哉？“琼楼玉宇”，识其忠爱；“缺月疏桐”，叹其高妙，由于志之正也，若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则其志可知矣。

他指出词所言之“志”，必须是那种与文人出处大节相关的社会性情感，就如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词中所流露的那样,方合于志之“正”;他同时排斥“绮罗香泽之态”所表现的男女侧艳之情、淫荡之志。进而,他将儒家的诗教原则引入词旨:“词者诗之余,当发乎情,止乎礼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离骚》之旨也。”

这里沈祥龙所树立的,乃是一个社会政治价值标准。于是,“词为小技”的观念当然不攻自破。他说:“以词为小技,此非深知词者。词至南宋,如稼轩、同甫之慷慨悲凉,碧山、玉田之微婉顿挫,皆伤时感事,上与《风》《骚》同旨,可薄为小技乎?若徒作侧艳之体,淫哇之音,则谓之小也亦宜。”他认为词体本身并无所谓大小之分,全视其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和情感品格而定,而在情感的正大和卑下之间作出了自己的取舍,即推动“伤时感事”之旨,严斥“侧艳之体,淫哇之音”。我们还可发现,沈氏推动“伤时感事”,无形中打破了在豪放、婉约之间抑扬褒贬的陈旧观念,合“慷慨悲凉”与“微婉顿挫”二者,皆通于正大之志。以上看法,显然是常州派尊体观念的合理延伸。

同于上述看法的,尚有张祥龄、莫友芝、黄彭年等。张祥龄《半篋秋词》序录有云:“词主谏,与诗同流。稼轩《摸鱼儿》,《酒边》(向子諲词集)《阮郎归》,鹿虔扈之‘金锁重门’,谢克家之‘依依宫柳’之属,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此固有之,但不必如张皋文(惠言)胶柱鼓瑟耳。”莫友芝在《香草词序》中也说:“词自皋闻选论出(指张惠言《词选序》),其品第乃跻诗而上,迥然《国风》、乐府之遗,海内学人,始不以歌筵小技相疵褻。嘉道以来,斯道大畅,几乎人《金荃》而户《浣花》,……其引喻不出美人香草,而古今升降、事物变态,罔不可以掇诸言意之表,荡埋郁而理性情。”黄彭年亦谓:“贤人君子,感时触物,吟咏性情,主文谏,诗人之意,犹未远乎!”(《陶楼文钞》)从中可见张惠言“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之”(《词选序》)的诗词同源

异流说在晚清造成的反响；而要求提高词的“品第”，发挥“感时触物”、“荡埋郁而理性情”的抒情功能，起到可以观“古今升降，事物变态”的社会认识作用，实在是近世士大夫知识分子之时代忧患意识的微妙折射。

第二个方面，是对词体审美属性和鉴赏规律的探讨。

张惠言引经传之语，以“意内而言外”界定词之体性，周济继之，又标榜比兴寄托，响应者几乎千人同声。刘熙载《艺概》引徐锴《说文系传·通论》曰：“‘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在言之外也。’故知词也者，言有尽而音意无穷也。”郑文焯《瘦碧词序》则专从“音”的角度，即词合乐应歌的性质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言生声，声生律，古人按律制谱，声来被辞，必以可歌者为工。”似未能解得张皋文本意。张德瀛《词徵》试图调和“意内言外”和“音内言外”两种说法，谓：“《周易孟氏章句》曰，意内而言外也，《释文》沿之。小徐《说文系传》曰，音内而言外也，《韵会》沿之。言发于意，意为之主，故曰意内。言宣于音，音为之倡，故曰音内。其旨同矣。”谢章铤于此能力排众议，独出己见，批评时人用“意内言外”作为“通套语、门面语，流传习用，且若奉为指南，而不知其与本义不相酬者”（《赌棋山庄词话》），他认为“凡文皆当意言兼美，则以意内言外论词未尝不深中肯綮”（《张惠言〈词选〉跋》）。但仅以“意言兼美”释之，又嫌太泛。这里我们还是重点介绍沈祥龙关于词之体性的见解：

《说文》：意内而言外曰词。词贵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令读者郁伊怆快，于言外有所感触。（《论词随笔》）

这一见解道出了词体长于委折入情的体性特征，以及兴发感动的审美功能。在此基础上，他将词体与诗体在表现手法上的相异作了比较：“诗有赋比兴，词则比兴多于赋。……盖心中幽约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回要眇以出之，而后可感动人。”这样，就将“意内言外”之论题与“低回要眇”之风格、比兴寄托之手法融汇

贯通起来，而注目于词之审美属性，显得通达而少学究气味。沈祥龙还称运用寄托为“寄言”，认为“寄言”之作“如镜中花，如水中月，有神无迹，色相俱空”（《论词随笔》），特别倾心于浑含不露、若即若离之美感。这些意见，都是对词体审美属性及其鉴赏规律的认知。我们翻检一下晚清词人的词集序跋，发现所论大同小异。如俞樾《顾子山〈眉绿楼词〉序》云：“词之体，大率婉媚深窈，虽或言及出处大节，以及君臣朋友遇合之间，亦必以微言托意，借美人香草，寄其缠绵悱恻之思，非如诗家之有时放笔为直干也。”冯煦也说：“揆之六义，比兴为多。……其旨隐，其词微，类劳人思妇、羁臣屏子郁伊怆恍之所为。”（《阳春集序》）蒋敦复则别倡“以有厚入无间”之论。蒋氏称童稚时曾识周济，并读其《存审轩词》，以为“真得意内言外之旨”（《芬陀利室词话》）。其所著词话三卷，云“缠绵婉约中，得深厚之致”，“寓意深处，非浅人所能梦见”，“比兴无端，言有尽而意无穷”，“蕉萃婉笃，恤乎若有隐忧”，“咏物作题外取神最妙”，所论与上述诸家亦大略相同。

树立艺术规范，总结作法技巧，是晚清常州派词论家致力闡畅先辈绪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张惠言区分唐宋词正变，以为温庭筠最高，张先以下八家“渊渊乎文有其质”，而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则“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词选序》）。周济则标举周邦彦、吴文英、辛弃疾、王沂孙等宋四家词，力贬姜夔、张炎之一味清空，这意味着常州词派以师古和崇尚质实为前提的艺术创作规范的正式确立。后来者多推崇张、周的《词选》、《词辨》和《宋四家词选》等选本“屏去杂流，途轨最正”，“步骤井然，洵乎暗室之明灯，迷津之宝筏”（蒋兆兰《词说》），推波助澜，循途步趋，于是宗北宋、尚质实、尊周吴终于成为晚清作者的普遍创作习尚。操觚为词，辄曰我学五代、学北宋，甚且互张南北之军，争执骚坛